

论泰国自由泰政府时期的华文教育

[泰国]张美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二战结束后最初几年,泰国华文教育出现了井喷式的复兴现象,其迅猛程度和发展规模史无前例。究其原因,一是自由泰政府调整了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使其有了宽松的发展空间;二是由于中泰建交后,中国民国政府对华文教育发挥了推动作用;三是自由泰政府因忙于处理战后所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难题而放松了对华文教育的管理和控制,从而扩大了大办华文教育的自由度。

关键词:泰国;自由泰政府;华文教育;华校

中图分类号:D634.3/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1)03-0061-0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泰国华文教育出现了井喷式的复兴现象。也许因为銜披汶政府时期的排华政策对华文教育的过度打压,1938-1940年勒令封闭当时所有的242所华校^[1],把华社办教育的欲望和能量压缩到了接近爆炸的临界点,所以,当1944年披汶政府垮台和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自由泰政府上台,致使这种能量突然迸发出来,形成了战后初期华文教育的井喷现象。在泰国的华文教育史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不过,这一时期极其短暂。1948年,披汶再次发动政变重新上台,致使这种迅猛发展成为昙花一现。披汶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沿袭了披汶的华教政策^①,严格意义上的华文教育^②最终没有走出低谷。本文试图探讨导致这次华文教育井喷式复兴的内外多重原因。

一、自由泰政府时期华文教育的井喷式复兴

泰国的华文教育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个高潮。高潮的突出特点是,

收稿日期:2011-04-21

作者简介:张美君(Panadda Srisuwannapop),女,泰国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如限制各府的华校数量、享受政府资助的华校每周中文授课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中文只是外语课,不计成绩。参见他威·替拉翁赛里《泰国华人的法律地位》(泰文),硕士论文,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973年,第128页。

② 笔者同意梁英明教授关于“华文教育”的定义:“所谓华文教育就是以华文为母语和主要的教学媒介,以培养学生对祖(籍)国(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进行这样的教育的学校就是真正的华文学校。”因此,虽然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泰国又兴起了学中文浪潮,但这已不应再称为华文教育了,而应称为“汉语教学”、“中文教学”或“华文教学”。参见梁英明《关于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概念的商榷》,《研究与探讨》2004年第6期。

这期间新建华校的数目与日俱增。1927—1930年,每年新开华校达12—16所。1921年,全泰有30所华文学校,到1928年,全泰华校达到了188所。而到了1932年,已将近200所。到1938年后,约有300所华校,这是华校史上的高潮。^[2]

但是这一高潮以銮披汶的上台而告结束。披汶于1938年上台后便大力推行唯泰主义(或称大泰主义)政策,即以泰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中心,排斥打击华人,开了泰国反华排华的先河。^[3]这期间,华文教育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了披汶排华政策的牺牲品。在披汶政府时期,对华文教育推行严格的管制措施,查封了很多华校,其中包括当时规模最大的华校“新民学校”^[4],直到1944年他的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几乎全部华校被取缔和查封。这个时期是泰国华文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44年亲日的披汶政府垮台,接管政权的是在战时坚持地下反日的政治组织“自由泰运动”。披汶政府的垮台、自由泰政府的上台,特别是日本的战败,使泰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于是,在泰国出现了华文教育井喷式的大复兴。“华文学学校的命运才开始有所转机,宛若‘枯木逢春’纷纷复苏”。^[5]“新建的华校‘如雨后春笋滋长,此兴彼起’。华人子弟以学习华文为荣,纷纷进入华校研读华文。泰华社会掀起学习华文、争办华校的热潮。”说的是中国话,唱的是中国歌,升的是中国国旗,它们是泰国境内的中国学校。到1946年底,复办和新办的华校达500所,在校学生达17.5万人。^{[6][7]}最初,只有少数学校向政府注册,全泰仅38所学校注册,其他大约500多所未经注册。到1948年,据泰国教育部统计,允许注册的华校达426所,在校学生达6万多人。^[8]

不仅华校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学校的规格也提高了。战前,绝大多数华校为小学,二战后涌现了一批中学。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洋中学。该校创办于1946年5月,是战后由华侨新创办的一所华侨中学,也是一所进步的新型学校。该校的领导和师资阵容相当强大。许多校长和教师从中国广州、上海、北京、香港、潮州等地招聘而来。校长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卓炯先生,副校长是潮州著名教育学家邱秉经先生。开学时,该校有学生200余人。该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一、二年级各一班,后又设文科专修班、师资班、以及成人业余校部,后又开设了以泰文为主的高中部。学生人数激增到1500人。^[9]该校成为泰国影响最大的华文学学校,为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兼通中泰两种文化的人才做出了贡献。

其次是潮州会馆创办的潮州中学。办学宗旨是,培养侨生生活技能,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沟通中暹文化。1947年12月开始招生,共录取267人,分初一、初二、初三3个年级共7个班。1946年8月复校,设有初中3个年级共17个班,共招学生700余人。^[10]此外,还有介石中学、海南会馆主办的育民学校的初中部、客属会馆主办的进德学校增设的师范班、以及复办的中华中学、黄魂中学等。

除了曼谷出现新办和复办华校的办学热潮以外,在外埠各地也出现了不少新学校,基本上每个府都有两所华校。在清莱,战前只有1所华校,但战后仅1946年一年,在清莱几个区又建起了4所华校。^[11]

二战后,泰国国内外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上,日本战败,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在国内,同日本结盟的披汶政府早已垮台,接管政权的是亲民主的自由泰政府。自由泰政府不承认披汶在战时同日本结成的同盟关系,站到了英、美、苏、中反法西斯盟国一边,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这一切导致了泰国政府对华侨华人及华文教育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一政策的调整给泰国国内华文教育带来了自由、宽松的空间。由于中国成为二战的战胜国,泰国华侨华人也开始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因此在办学方面比战前更加光明正大、放心大胆。在学制年限、教学管理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与祖国无异”,“完全依据中国国内学校,初小4年、高小2年、每学年分春秋两个学期。每周授课32学时,泰文仅有5学时。”

当时的华校还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所有华校分为三派。一是右派,倾向国民党的蒋介石

政府;二是左派,倾向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三是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左派华校,大部分规模较小,资金也较少,这些华校均依法进行了注册;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在校挂泰国国旗。极右派与中立派的华校,当时尚未登记注册。华校各派在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差异,造成华校陷入政治竞争状态。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所以当时的泰国华校就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进行政治活动、讨论政治的舞台。^[12]

随着华文教育的发展,泰国华人社会建立了第一个协调全国整个华文教育的组织机构——暹罗华侨教育协会,简称教协。该组织成立于1945年11月,由邱及倡议,吴刚、黄耀寰等人发起。许元雄与吴刚先后担任主席,具体事务则由郑宏负责。成立时参加者仅近百人,后来增至数百人,并在泰国内地一些府县设立分会。该教协宗旨是:团结广大华教工作者,推进华校的恢复和兴办,发展侨社民主进步教育事业。协会在推动团结侨社,创办华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会成立后,开办两期华教师资培训班,首批100多名。后两批有南洋中学出面负责,为本校和侨社教育事业培养骨干,参与并承担曼谷南洋中学的筹建工作。当时,该协会还出版了《教育通讯》,为联系华校和交流教学经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教协的影响下,泰国各地华侨举办各种学习班200多个。

战后华侨办学热情高涨,各地都在积极筹办华校,教育界人士大都意识到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合作。1946年1月14位华侨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恢复和发展华侨教育的12项主张,请李铁铮大使代表侨界向泰国官方协商;此后经多次开会协商,成立了以进步团体——暹罗华侨教育协会为基础的“扩大教协组织委员会”,到会的全体会员达41个单位,个人会员440人,李铁铮大使应邀出席并致词。这是战后泰华教育界全面团结的一次盛会。^[13]

1948年4月,披汶发动政变上台后,恢复了他的排华政策,致使教协转入地下,南洋中学被封。由于此时由南洋中学创校委员会委员林羽民、蔡奕楚创办的大同学校被火焚毁,大同学校于1946年2月迁入南洋中学校址,校务由教协接办,直到该校于1950年被泰国当局查封。教协很多执委相继回国,其影响也逐渐式微。

暹罗华侨教育协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反映了战后华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对华文教育事业的热衷,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华校迅猛复兴的内在动力,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出现的空前自由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活动的空间。

华文学校数量的猛增和华文教育的空前自由是这个时期泰国华文教育的最主要特点。这也是泰国华文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兴盛繁荣的顶点。然而,很可惜,这一繁荣和兴盛只是昙花一现,仅持续了3年。下文将从3个方面探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二、自由泰政府及其对华教政策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期间,披汶政府投靠日本,推行卖国求荣的政策,这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日本占领时期各种爱国反日势力蓬勃兴起。其中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和领导的一个地下抗日爱国运动,即“自由泰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是民主主义者比里·帕依荣。比里因反对向日本借款而被剥夺了财政部长职位。^[14]由于阿南多·玛希伦国王年幼,比里被王室任命为国王的摄政官。当披汶发表泰日联合对英美的宣战书时,作为摄政官,他拒绝签署宣战书。^[15]他同盟国建立了广泛联系,团结国内外抗日爱国力量。许多爱国军政官员倒向自由泰运动,国内外成员达5万人之多。^①

在国外,驻美英的使馆人员也参加了自由泰运动。他们在国外接受各种训练,回国后直接参加

^① 关于自由泰运动的人数,各种资料说法不一。详见索拉萨·那卡藏昆吉:《1938-1949年自由泰运动与国内的政治矛盾》(泰文),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88年,第10页。

国内的反日活动。1944年8月,积极支持披汶政府的日本东条内阁垮台,从而动摇了披汶的统治。披汶的迁都提案在国会表决失败后,他被迫辞职。自由泰运动的军官宽·阿派旺组成了新内阁。从此,自由泰运动和其他反日爱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到这年年末,各地的抗日武装达5万人。

日本投降以后,作为国王的摄政官,比里以国王的名义发布了和平宣言,宣布披汶政府对英美的宣战无效,并答应把战时获得的4个马来邦和掸邦交还英国。这时,比里实际上成为泰国最有威望和权力的领导人。由于他同宽的某些政见上的分歧,宽于和平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就辞去总理职务,由另一个自由泰主要成员他威·汶耶革组成临时内阁政府。后来政府几经更迭,但均属于自由泰政府。这期间,权力实际控制在摄政官比里手中。

在这种政治大背景下,自由泰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政策也同披汶的政策大相径庭,采取了温和、宽松的政策,顿时使华文学校和整个华社大有松绑之感。

战后,自由泰政府没有精力关注华文教育问题,所以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华校的新条例,还是履行1936年制定的《国立学校条例》来管理华校,不过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在许多方面也比较通融。同时政府也尽可能为建立华校提供帮助。根据1946年教育部国立学校局的记录,当时对华校的政策包括以下几点。1、教育部已批准建立华校共38所,同时还在继续接收开办华校的申报材料,政府也尽量对华校给予配合。2、教育部无意奉行排斥华校的政策,在泰国所有的泰人办的国立学校,以及外国人办的学校,均按《国立学校条例》同等对待,尤其是所用课本必须符合当局的规定。3、不强迫华人子女必须上泰文学校。4、无论是泰人、华人还是外国人办的中小学国立学校,小学班教授外文,每周不得超过5小时30分钟。接收年龄超出《初等强迫教育条例》规定的学生的学校,可按民校条例向政府申请只讲授外语,不讲授泰文与其他必修课。5、教育部已规定了向政府申请建立华校的程序。6、教育部准许在中学的外语课中以中文代替英文。7、教育部还规定中文为大学预科文学系的选修课。8、目前发现有些华人不遵守《中小学教育条例》与《国立学校条例》,泰国政府考虑到中泰两国友谊的重要性,所以先派官员向他们提出警告,后再按法律规定做出惩罚。9、如果华人按民校条例规定执行,他们就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16]

同披汶时期相比,自由泰政府的华文教育政策不只是大大放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鼓励。这种政策上的巨大变化主要来自3个方面的影响。其一,自由泰政府本身在政治立场上就同披汶有很大的不同。披汶是亲日派,是与中国为敌的;而自由泰是亲民主和亲五大盟国的,当然,在战后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必然是友善的,因此在华人问题和华文教育问题上基本上采取的是同情和理解立场。其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迫使泰国不得不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中国作为战胜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摆脱了战前软弱可欺的落后形象,这使得战后泰国政府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其三,自由泰政府深知在战前和二战中,泰国华侨华人以及华校饱受披汶政府时期的排斥、打击,甚至镇压,使他们遭受不少苦难,所以自由泰政府对华社和华校怀有歉疚之感,因此采取温和、宽松与和解的态度和政策,以缓和华社同政府间的矛盾。

三、来自中国方面的推动力

1946年中国政府同暹罗建交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上,暹罗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国,存在着朝贡关系,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泰国沦为英法两个殖民大国的缓冲国之后,中泰两国就再没有任何官方往来。1921年至1936年,中国政府多次派代表到泰国商谈建立邦交事宜,也有一些泰国官员访华,但因种种原因两国终未建立外交关系。余定邦认为“由于两国的国籍法不一致,在如何处理华侨的国籍问题上意见不一,是迟迟不能达成协议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正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泰国政府奉行的是亲日的外交政策,这是中泰无法缔约建

交的根本原因”。^[17]

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中国成为五大战胜国和自由泰政府上台为两国建交提供了契机。泰国的披汶政府在二战期间同日本结盟,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将泰国视为交战国,蒋介石称“我们的作战方针只把泰国看作日本军队的占领地,并不看作我国的敌国”。^[18]实际上,早在1942年,坚持地下抗日的自由泰运动曾派代表前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希望同盟国建立联系,但前后派了两组特使均未到达目的地。第三次派出的代表到达了重庆,与盟国建立联系,他们本人也成了自由泰运动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1945年1月,自由泰政府上台后,比里派出了以陶沅·乌隆为首的自由泰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会谈中,泰国方面提出,泰国在英国被冻结的资金有1.5亿铢,在美国被冻结的资金为2300万铢,可充做新政府的经费,泰方要求中方出面说服英美将这些资金解冻。中方谈判官员完全同意请英美两国将这些资金交给自由泰政府使用。中方还一再表示,中国对泰国的领土绝无野心,将支持自由泰组织,把它看作是盟军进攻泰国的内应,使它在战后的泰国拥有强固的地位。中方还表示对泰国当尽力帮助。陶沅·乌隆团长表示,希望中泰两国在战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互派使节。^[19]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说,“我们始终认为,泰国对我盟国宣战,是处于被动,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因此,我们希望泰国在战后恢复其固有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尤希望其与中国迅速建立正常之国际友好关系”。^[20]至此,双方都有了建交的共同愿望。但究竟何时启动建交程序尚未确定。然而一个突然事件把双方直接接触和建交谈判提上了日程,这就是“耀华力路事件”。

中国抗战胜利后,大大鼓舞了在泰国的华侨,整个曼谷唐人街欢喜雀跃,喜庆胜利,他们无视泰国政府关于在悬挂他国国旗时必须同时悬挂泰国国旗的规定,高悬中国国旗,高唱中国国歌。曼谷警察出面干预,结果有人从一所建筑物窗户开枪,军警立即还击,最终造成了流血冲突。为解决这一冲突事件,泰国政府邀请中国派出政府代表前往曼谷。1946年1月10日,以驻伊朗特命全权大使李铁铮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曼谷。接着双方代表进行会谈,首先谈及耀华力路事件。泰方对此事表示遗憾,而中方提出了3项要求:一是查明肇事者之责任,承办犯罪者;二是赔偿我侨胞全部损失;三是保证将来不发生同类事件。之后会谈集中讨论建立外交关系事宜。结果,李铁铮团长和社尼·巴莫总理于1月23日签署了《中暹友好条约》。

条约突出强调“此条约国人民取得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在对方境内,享有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暨集会、结社、出版、礼典、信仰之自由。”^[21]在中国和华侨方面,该条约被理解为,泰国的华文教育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而且中国对华侨教育可以拥有管辖权。于是,李铁铮大使于1946年11月宣布,中国政府将扩大泰国华侨教育,重新整顿泰国的华文学校,并由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管理华文教育,甚至计划设立华文师资培训学校及师范大学,以教育在泰国的华侨。

不久,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照会泰国教育部提出如下要求。1、华侨应有设立华校之自由。2、由中国大使馆核准之华校校长及教师,应依该职行事;不教授泰文的教师不应规定须有泰文学历。3、小学课程,以中文教授国文、中国地理及历史,且每周授课时间不少于12课时,至于其他科目(除泰文、泰国地理及历史外),得许以中文或泰文授课。4、中文课本,经中国教育部核准后,泰方不必再审核。5、泰方须归还以前所封闭及占用的华校的场地及设备。6、泰方应以征自华人的税款补贴华校。^[22]

该照会的要求显然有干预泰国内部事务之嫌。泰方拒绝接受上述要求,认为虽然友好条约规定双方享有设立学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但条约也载明此项自由“依照彼缔约国之法律章程”去取得。为此,泰国外交部做了如下回复。1、依法律规定设立民校,政府不予质疑。2、民校校长及教师须依民校条例,并在教育部的管辖之下;非教授泰文的教师的泰文学历,泰方接受考虑,在此期间可通融,惟须在1年内考取。3、小学教授外文,每周不得超过5课时30分。4、中文课本,须先获教

育部核准才能使用。5、相信并无占有被封闭华校的事情,至于租赁和借用,应与租用和借用者直接接洽。6、小学扶助款用于一般小学教育,不能仅用于为教授中文为目的的学校。尽管泰方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但在中方仍直接和间接地施加压力之后,泰方还是做出了让步。^[23] 1947年5月,李铁铮大使又派一等秘书欧阳纯与泰国教育部代表谈判,最后达成3点协议:1、初级小学(即收强迫班年龄之学生)每周教授华文课的时间,规定一年级为10小时30分钟,二年级为11小时30分钟,三、四年级为12小时30分钟;2、师资方面,非教授泰文者,无须考试泰文,但对其所授之课程,应有合格之证书或学位;3、关于中学男女同校,泰方表示无异议。^[24]

在华文教育方面,中泰双方新协议的达成,给予泰国华人社会和华文教育界以极大的鼓舞。虽然原来的《私立学校条例》和《初等强迫教育条例》继续生效,但在执行过程中,已有了大大的放松,很多方面都给予了通融。这些都为战后华校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同当时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泰的建交,再次是建交后的不懈交涉。

战后出现的新移民潮为泰国华校补充了师资力量和大量生源。20世纪泰国出现了两大来自中国的移民潮。第一次开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次移民高潮一方面是因为1894年清政府第一次废除了一直奉行的抑制向海外移民的政策;二是20世纪初南洋铁路的修建、采矿业和橡胶园的开发大量吸引了中国的劳工;三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政治的动荡导致大量难民外流。这次移民高潮到了30年代初开始走向低潮,主要原因是受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泰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大衰退,大量劳工失业,从而进入泰国的中国移民急剧减少。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到了30年代末和40年代,特别是战后最初几年,来自中国的移民又恢复了增长的势头。1937年,入境泰国的中国人达60000人,其人数为历年最高。^[25] 战后的1945-1946年一年中,华人移民进入泰国达170000人,至1947年,国家研究处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总人口17643000人,华人2124000人,占总人口的12%。^[26] 1950年,华人占总人口16.7%。^[2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的华人为躲避日本军队的屠杀,部分逃回国内。但泰国的情况不同,由于泰国采取了同日本合作的态度,因此这里的华人并未出现回流,相反还有所增加。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向泰国的移民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形成了第二次移民高潮的顶点。

第二次移民高潮顶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国共内战所致,兵荒马乱迫使人们外出谋生。另一方面是泰国自由泰政府放宽了对中国移民的控制。还有一个因素是1946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全权代表李铁铮与泰国总理兼外长社尼·巴莫签署《中暹友好条约》。这是自1854年泰国最后一次向中国朝廷朝贡以来,中泰官方第一次确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泰两国关系正常化极大改善了泰国华侨华人的处境。中国移民入境也无限制,导致泰国华侨人数迅速增加。

这次移民潮来势凶猛,以至于引起泰国官方的担忧。在1946年8月份的下半月,超过配额的中国移民就达2000多人。当时的内政部长透露,在中国汕头等待前往泰国的中国人有4万-5万人。据官方统计,1946年,来自中国的移民6月份约3000人,7月份4000人,8月份更多。^[28] 据报道,7月份在汕头出现了一个买船票高峰,原因是听说政府不久要提高移民税。

移居泰国的中国移民,有些是年幼的儿童,须入华校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有些是知识分子,因国内战乱求职无门,于是变卖家当,奔向泰国充当教员,“已解决饥辮之急”。华人大量移民泰国,增加了华校的学生数量,增强了师资队伍,给泰国华文学校注入了活力。^[29]

这次移民高潮给泰国的华文教育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是为各华文学校输入了一批新的师资,包括从欧美返回泰国的海外学子。“中国西南联大及其他各地文教界人士和学者纷纷来泰执教”^[30],这批师资力量为战后初期华文教育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后民国政府加强海外华文教育的支持和指导也对泰国华文教育的复兴起到促进作用。自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便开始关注海外侨民的教育问题,不但建立管理海外教育的有关机构,也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这些在二战前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海外侨民的教育问题的注意力由于抗战而受到影响,但仍然没有完全忽略。

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在海外侨民教育的管理问题上仍出台了一系列的办法和措施。1944年6月22日,民国政府颁布了《战后侨民教育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奖励侨校优秀教师,凡在侨校任教6年以上,经视导员核其教学成绩优秀者,得予以1年之假期返国实地考察”。为了健全对海外教师的鼓励制度,后来还出台了《教师服务奖励规则》。根据此规则,在侨校服务年限较长,成绩优良之教师分别授予“智”、“仁”、“勇”3种奖励,以鼓励侨校教师进一步为华侨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31]《战后侨民教育实施方案》还计划在国内增建或扩充国立师范学校,增加其班级与学生的名额,毕业后充任各地侨民小学的教师;在国立师范学校增设侨民教育师资班,培养侨民中学教师以供各地侨民中学之用。《战后侨民教育实施方案》对华侨教育在战后的复兴和重建问题上也做了规划。^[32]

日本占领东南亚期间对当地的华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迫使许多华侨青年逃回国内。为收容安置归侨、难侨学生和战后华侨教育的复兴,教育部先后开办了3所华侨中学、两所华侨师范和两所专科学校。通过培养师资来提高华侨教育的水平,促进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33]

抗战胜利以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复兴善后会议”,通过了《南洋华侨教育复兴计划》,对战后华侨教育再次做了规定。强调在实施该计划前要做好3项准备:调查南洋各地华侨学校的损失和提出拨款的数额;筹备各地侨校的恢复或回迁工作;商请外交部与有关各国订立新条约时,设法摒除过去南洋侨校在当地所受的束缚。其具体办法是:甄训与培养师资,编制各级华校课程及从速编写、供应南洋各华校教科书,增加华校补助费及筹集学校基金,鼓励华侨中学毕业生回国深造。^[34]

民国政府采取的上述种种政策和措施有利于战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复兴和发展。毫无疑问这些政策也惠及了泰国的华文教育。战后,当国共两党的内战再起的时候,许多受过培训的归侨青年又返回原住在国从事华文教育。民国政府的这些政策和鼓励措施无疑是对战后泰国华校迅猛复兴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四、中国战胜日本本身对泰国华文教育的积极影响

日本投降后,自由泰政府在外交上面临一个最急迫的问题,即摆脱日本盟国的地位和洗刷战败国的名声。作为第一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作为国王摄政官的比里·帕侬荣发表《和平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战时披汶同日本签署的盟约无效。9月11日,泰国宣布废除战时同日本签署的一切条约,14日将日本的外交官拘禁在其住所,17日禁止日本侨民离开各自的居地。至此,日本在泰国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全部废止,同日本的同盟关系宣告结束。紧接着,泰国便开始了对美、英、法、中展开了友好外交攻势。

实际上,在战时,美国是自由泰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泰国驻美国大使社尼·巴莫亲王就是当时自由泰的领导人。战后不久他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回到泰国领导自由泰政府。因此,当泰国发表和平宣言时,美国立即表示接受,不再认定泰国为交战国。加之战后冷战战略的需要,美国极力想把泰国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泰国很快得到了美国的谅解。美国承诺帮助泰国加入联合国,拨给泰国1000万美元用以修复铁路,还为泰国提供剩余军用物资和技术援助。

与美国相比,同英法关系的缓和以及结束敌对状态并非那么顺利。1945年英国政府向泰国提出了21条要求,诸如泰国归还从缅甸和马来亚手中夺得的属地,全面恢复英国的财产、贸易特权、无限期驻扎军队等权利。最后泰国借助美国的影响迫使英国放宽了对泰国的要求。泰国于1946

年1月与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了停战条约，泰国退出兼并的马来亚北方4个邦和缅甸2个掸邦，并归还所有被掠财产，赔偿英国公民因泰国的战争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保证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开凿克拉运河，并向正处于战后饥饿之中的英国赔偿150万吨大米，还将国名恢复为暹罗。^[35]

在处理同法国的关系时，法国提出的要求是：归还泰国战时占领的印度支那领土；废除法泰1941年签署的条约；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外交关系。此外，法国还提出修改边界等要求；赔偿法国在1941年时法泰领土纠纷中的损失。结果，泰国接受了法国的要求，而法国则同意支持泰国加入联合国。^[36]1945年11月17日，法泰在华盛顿签署了协定，泰国将1941年占领的老挝、柬埔寨的土地移交给法国，从而结束了战争状态，恢复了正常关系。

1946年1月，泰国同英美等国建交之后，便开始积极展开同五大战胜国之一中国的和平外交。11月，自由泰政府领导人比里来到中国，争取中国支持泰国加入联合国，希望中国在安理会投泰国一票。蒋介石表示，自由泰及抗日阵线对同盟国做出了贡献，中国没有把泰国视为战败国。中国政府已通知在安理会的代表，为泰国加入联合国投赞成票。由于中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泰国在1946年12月16日加入联合国。

在内政方面，自由泰政府推动议会制度，这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是抑制军队影响，从而削弱披汶权力的一大举措。但在实行宪制的过程中并不顺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1944年披汶政府下台后，代表自由泰运动的陆军军官宽·阿派旺接任了总理。这时候，自由泰运动内部实际上已经分裂，出现了左中右三派，虽然三者间有矛盾，但在推动宪政方面目标是一致的。1946年4月当新宪法颁布，准备举行全国大选之际，自由泰运动于1945年9月25日宣布解散，所形成的三派分别组成了3个政党以便参加大选。左派组成了沙哈奇党，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代表泰国东北部的下层民众。中间派组成了由探隆·那瓦沙瓦为首的宪法阵线党，主张民主主义，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前政府官僚家庭。另一些中间派组成了自由党。原自由泰运动的右派组成了由宽和社尼领导的民主党，奉行保守的民主主义和保皇主义，主张提高王室的地位。该党代表上层社会，其主要领导成员来自前政府高官和王公贵族家庭，其主要政策是维护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利益。^[37]

大选结果，没有一个党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在议会中实际上出现了两大势力。一是亲比里的两大政党：沙哈奇党和宪法阵线党，奉行自由民主主义，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另一大势力是由宽领导的民主党，奉行保守的民主主义，代表地主、上层官僚和王室的利益。议会推选德高望重的比里担任总理，但他以有更多工作要做为由，婉言谢绝。后来，议会又以微弱多数选举宽为总理。他上任总理后，就一头倒向保守的上层官僚。不久，国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宽随即辞去总理职务，后又选举比里为总理。比里上台后，政局并不平静，他同宽在上院的组成和权力方面存在着很大分歧，比里仍坚持上院由民选产生，而宽则主张由国王从上层社会任命。

自由泰政府面临的另一项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置战时的亲日派，尤其是披汶等人。社尼上任总理后，所作的一件大事就是惩办战犯，于是便颁布了惩办战犯的条例。首先，依照条例将披汶、威集等一批亲日分子软禁或羁押，然后准备审判。但是，根据通行的法律不得溯往原则，该条例并未生效，因此，披汶等人不久又被释放。获释后，披汶之流便伺机向自由泰政府反扑。

1946年6月9日，即比里出任总理不久，年轻的国王在王宫卧室中遭枪击毙命，尽管从当时现场的勘察和后来长达7年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此事件与比里有关，但还是有人怀疑比里与此事有牵连，因为国王毕竟是应比里的邀请从留学的瑞士回国做短暂停留的。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政敌披汶之流便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对比里兴师问罪。在政治困境中，比里被迫辞职，但他仍极力维持自由泰政权，遂推荐“宪法阵线党”的领袖探隆·那瓦沙瓦出任总理。后来比里被迫流亡国外。

在短短的3年内,由于复杂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困扰着自由泰政府,致使该政府无暇顾及次要的华校问题。政府对华校管制的忽略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泰国华社方面,战后的情形与政府完全不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在泰国的华人欢欣鼓舞,采取各种方式庆祝这一胜利。他们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看成五大战胜国之一的国民,因此无不兴高采烈。这一胜利鼓舞了广大华侨的民族自豪感,更加努力去捍卫、传播和学习中华文化,创办和复办华校的热情和勇气自然十分高涨。

这种情绪和士气表现在华校上就是无所顾忌地从事华校的创建和复办活动,甚至还有人认为,披汶时期华文教育遭到了政府的疯狂打压,现在要以建立更多的华校来报复政府过去的打压政策。凡此种种都激励着华人社会踊跃地推动华文教育,从而造成华文教育迅猛复兴的局面。

注释:

- [1]披猜·拉达那蓬《对华校管制的演变》(泰文) 硕士论文 国家发展行政学院(NIDA),1969年,第92页。
- [2][5]洪林《泰国华文学史》,泰国泰中中学会,2005年,第163、51页。
- [3]普哇顿·颂巴赛《泰国政府对华人的政策(1932-1957)》(泰文) 硕士论文,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976年,第78-103页。
- [4]阿蓬·央素丽《华人英雄谢光义》(泰文) 泰国:曼谷班帕阿替出版社,第99页。
- [6][29]李玉年《泰国华文学校的世纪沧桑》,《东南文化》2007年第1期。
- [7]卡咋派·布禄帕《泰国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安全》(泰文) 泰国:曼谷派披塔亚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 [8]王棠主编《转轨中的华文教育》,中华文化出版社,第9页,转引自周聿娥《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 [9][10]冯子平《泰国华侨华人史话》,香港银河出版社,第202、203-204页。
- [11]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85; Direk Jayanama, *Siam and World War II*, the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Press, 1967, p. 186.
- [12][16]泰国教育部私立学校委员会特殊教育政策处《制定关于华校与外语教学的政策以适应当前形势》,泰国内阁会议文件,第10-11、11-14页。
- [13]潘少红《战后初期泰国华人进步团体探析》,《东南亚纵横》2007年10月,第31页。
- [14]素他猜·银巴赛《争夺泰国的计划》(泰文) 泰国:曼谷萨玛潘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 [15]谢远章、沈顺《泰国现代人物辞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 [17][18]余定邦《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19]《暹罗日报》(泰) 1998年9月23日,转引自余定邦《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21]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长编》第66册,第775页,转引自余定邦《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21][24]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4、105页。
- [22][23][26]修朝《泰中前后两次建交史略》,载崇圣大学泰中研究中心《泰中研究》第二辑,第164-165、165、164页。
- [25]吴凤斌等《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4页。
- [27]普哇顿·颂巴赛《当代海外华人》(泰文) 泰国:班艾有限公司,2004年,第172页。
- [28]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0.
- [30]沈顺《浅析泰国华侨、华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载陈碧笙选编《华侨华人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0页。
- [31][32]别必亮《近代国内华侨教育的政策与措施》,《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
- [33][34]方建新、傅建辉《民国政府时期南洋华侨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原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下转第86页)

[64] *Chinese Repository* , Vol. 14 , 1845 , pp. 580-581 ,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412242/>.

[65] [67] Marcus Aurin, "Chasing the Dragon: The Cultural Metamorphosis of Op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 1825-1935" ,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 *New Series* , Vol. 14 , No. 3 (Sep. , 2000) , pp. 428-429 , 428.

[责任编辑: 乔 云]

An Analysis of the Opium Policy of Philippine Government during U. S. Occupation from the View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SHEN Yan-qi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Fujian)

Abstract: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 1898 , the United States then took a policy to limit and eventually ban the opium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initial attitud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Asian opium trade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 This difference is thought-provoking , but from the point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n everything is reasonable.

Key words: The Open Door Policy , Philippine Government , U. S. Occupation , Opium Policy



(上接第 69 页)

[35] [36] 周寒丽 《简述二战结束后泰国为何能摆脱战败国地位》,《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4 期。

[37] 索拉萨·那卡藏昆吉 《1938 - 1949 年自由泰运动与国内的政治矛盾》(泰文),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88 年,第 201 - 208 页。

[责任编辑: 乔 云]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ree Thai Regime

Panadda Srisuwannapop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Beij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During the immediate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and education in Thailand had a rapidly an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s were , first that the Free Thai Movement government adjusted and loosened control policy towards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 second that after establishment of Sino-Thai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n 1946 , Chinese government was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and third that giving the priority to more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internal and foreign issues , the Free Thai Movement government had paid no much attention to management of Chinese schools , so that Chinese society had much freedom in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Thailand , Free Thai Movement Government ,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Chinese school